

「阳明门人」沈谧生平事迹考辨

谢忠志

一、前言

明人考取进士后，除一甲三人外，均需「进士观政」，经历一段时间后，再授与监察御史、六部给事或派往任职知县等官衔。在任官升任、迁调过程中，多数人会前往地方「道」加以历练。这些「道」，并不是明初就设有的地方制度，它建立在省、府之间，以布政司分守道、按察司分巡、兵备二道最具代表性，主官原为藩、臬二司佐贰，但随着明初以来强化中央集权，且对武臣缺乏信赖，自洪熙以后便以不通文墨、参赞军务等名义，将参政、副使等文职官员派往总兵官旁，从临时委派到逐渐定制，建立起一条以巡抚、兵备道官为主的「文臣军事领导体制」，文人知兵已成趋势，甚至已凌驾于武臣之上，为明中后期典掌军务的主官。

约从成化年间在各地逐渐建置的兵备道，在正德年间发生变化。正德十一年（1516），王守仁（1472-1529）为南赣巡抚，开始扫荡赣、闽、粤一带的贼盗；正德十四年（1519），则平定宁王宸濠（1476-1521）之乱。虽然王守仁自谦「将略平生非所长，也提戎马入汀漳」^①但与设置于成化二十三年的赣州兵备道通力合作下，^②「文臣军事领导体制」系统发挥作用，取得巨大成功，正如《明史》所言：「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③无论是阳明先生战时的用兵谋略、选材方法，战后的安置流民、地方的移风易俗等，其学说随着门生而传播到全国各地，激励儒生带兵的士气，提供可靠的经验参考。

王守仁年长沈谧（1501-1553）一辈，却有着类似的背景：同为浙江人士，同在南赣任官，因此沈谧深受阳明学说的感召，并奉为圭臬。本文透过考察沈谧的生平事迹，了解其任官时期对地方的经营成效，并检视其对阳明学说的实践状况，可约略了解王守仁对时人的影响。

二、沈谧生平

沈谧字靖夫，初号石溪，改石云，后改石山，^④浙江秀水人。沈谧并非明代知名人物，因而生平未被写入《明史》，《国朝献征录》、《本朝分省人物考》亦未搜采，即使在《明实录》，也仅有嘉靖十一至十三年（1532-1534）三条选官授职的记载。其生平事迹，以董份（1510-1595）《董学士泌园集》的〈明故湖广布政司右参石云沈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沈先生墓志铭〉）最为详尽。^⑤董份在〈沈先生墓志铭〉自述其撰写原因，来自于长子启原（1526-1591）之请：「启原以其友吏部进士余君状，又述遗事，遣人走数千里来乞铭记。」^⑥意谓内容多为长

^①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20〈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第744页。

^② 谢忠志，〈精兵简政：明代江西兵备道考辨〉，《成大历史学报》第57期，2019年，第40-41页。

^③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195，〈王守仁传〉，第5170页。

^④ 明·俞宪，《盛明百家诗》（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明隆庆四年刊本），《沈少参集》，第1a页。

^⑤ 王德毅的《明人传记数据索引》，是最早留意到〈明故湖广布政司右参石云沈先生墓志铭〉为认识沈谧生平最重要的史料。参见王德毅增订，《明人传记数据索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图书馆，1978），第177页。

子启原口述，因此内容可信有据。长子启原亦为进士，因此沈启原的相关传记，亦可拼凑沈谧生活点滴。此外，盛家亦为秀水望族，清人盛枫着有《嘉禾献征录》，有言：「是书所纪，皆明一代嘉兴人。」^⑦盛枫对嘉兴人物观察细致，亦对沈谧生平着墨。其余明代史料对沈谧的记载不多，仅能从方志、文集以及他人传记加以抽丝剥茧。

根据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以及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嘉禾献征录》等书记载，沈谧撰有《石云家藏集》一书传世，徐干学（1631-1694）在《传是楼书目》对此书则有「十三卷，四本」的纪录，但《石云家藏集》在清朝以后恐已亡佚。其著作目前仅存在俞宪（1508-?）编着的《盛明百家诗》，^⑧该书搜录有《沈少参集》一卷，成为了解沈谧仕宦与闲适间唯一的直接史料。

〈沈先生墓志铭〉是沈谧生平最完整的介述。沈谧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父亲为沈复，母亲贺氏，二人皆因沈谧显。沈谧为长子，有二弟。沈氏一族的溯源与发展，以焦竑（1540-1620）为次子启南所写的〈行状〉较为完整。根据焦竑撰述，沈家家世可追溯至北宋时期，世居汴京，后随宋室南渡迁居浙江会稽。洪武中，始祖沈庭芝自会稽徙松江再迁善乡；宣宗宣德时期，善乡改隶于嘉善，遂为嘉兴嘉善人。后因其子沈瑾被招为赘婿，而世居秀水长溪，便以孝悌力田为家风，^⑨沈家渐次开展。

此次迁居对沈家十分重要。宣德五年（1430），巡抚苏松等处大理卿胡槩（1385-1434）鉴于嘉兴生齿日繁，税粮数倍于他郡，政繁事冗，建请增县建官分理。宣宗于是下令，将嘉兴府从原本三县，析为七县，增设秀水、嘉善、桐乡、平湖四县。^⑩其中嘉兴、秀水两县，位在嘉兴府内，是经济最发达的属县；^⑪若单看秀水一地，以嘉兴人黄洪宪（1541-1600）在〈秀水县志序〉的描述最为贴切：「人士又多韶秀，娴文章，接轂傅圭，弁冕吴越间。」^⑫其经济、人文发展上更为全浙之冠。因此，沈家因地利之便，逐渐累积资产，父亲沈复以积攒闻名，^⑬祖父辈几代的辛勤，为日后沈谧父子仕进发展，奠定良好的基业。

墓志铭提及，沈谧就有非凡之处。小时雄才大略、能指挥若定，只是性好驰马，后因马蹶而遭父亲责难，才转而为学。沈谧据称天性聪颖，「儿时能日诵数百言，通其大指」，显示其强记、背诵能力已非寻常。^⑭此段对孩提时期的描述，似乎为日后为官之时，在文武两端均有一定成绩相呼应。加上沈家资产丰厚，让沈谧进入儒学就读，取得秀才身份并无难事。继而透过「例监」捐纳，成为例监生，并于嘉靖七年（1528）通过顺天乡试，成为举人。来年，即考取进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⑮沈谧在科考上十分顺遂。

沈谧的仕进从「行人」伊始。「行人」是三甲进士常被授与的官职，如夏言（1482-1548）、耿定向（1524-1596）等人均以此官衔踏上仕途。世宗依此惯例，选授沈谧为行人司行人，为正八品官员。行人司于洪武十三年（1380）置，在明代是很特殊的官职，虽专职捧节奉使

^① 清·永瑆，《四库全书总目》（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63〈史部十九·传记类存目五〉

^② 明·沈谧，《沈少参集》（《盛明百家诗》，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刊本）。

^③ 明·焦竑，《焦氏澹园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据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影印），卷33〈陕西按察司副使霁川沈先生行状〉。

^④ 《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页13a。

^⑤ 何淑宜，〈晚明的地方官生祠与地方社会——以嘉兴府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4分，2015，第816-817页。

^⑥ 明·刘应珂，《（万历）嘉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据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影印），卷27，黄洪宪〈秀水县志序〉，页1580。

^⑦ 清·盛枫，《嘉禾征献录》（据清钞本影印），卷22〈沈谧〉：「父复，以积着起家。」

^⑧ 根据张艺曦的考究，明人「过目成诵」或「日诵千言」者大有人在，均被视为极其聪颖。可参阅张艺曦，〈从一目十行、日诵万言看中国近世士人的博览强记之风〉，《明代研究》第34期，2020，第101-110页。

^⑨ 《嘉禾征献录》记载：「谧嘉靖戊子举人，己丑进士。」也就是嘉靖七年中举，嘉靖八年考取进士，但仅《嘉禾征献录》一书记述中举年份，〈沈先生墓志铭〉等相关史料均未记载中举年份。但查〈嘉靖八年己丑科殿试金榜〉，沈谧的确名列其中，因此，嘉靖八年考取进士是无庸置疑的。

之事，但实际上职务繁多，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差文武大臣往各王府持节行册封礼，本司官例充副使。凡开读诏赦、奉使四夷、谕劳、赏赐、赈济、征聘贤才、整点大军及军务祭祀等事，例该本衙门官差遣，不许别衙门侵夺。如临时乏人，方许别官兼差。」^①行人虽品秩低微，但在明初受到皇帝的宠信与重视，是另一种「以小制大」的体现。但中期以后，正如陈建（1497-1567）所言：「行人司行人之类，皆职清事。」^②被视为冗员。然而此清闲官衔，却升迁迅速，造成许多官员眼红与不满声浪四起，^③这或许是沈谧日后被长官刁难的原因之一。沈谧就任后，曾奉命出行山西代州，却面临浑源遭蒙古围城的考验：

尝使代，过浑源城，虏犯云中，而遣别骑围浑源，方粮竭甚恐。先生时在围，与其守议曰：「浑源、云中犄角，而虏虽强，不能久。今能尽发帑羨，得十日粮，因云中为形援，足持虏矣。」已而围遂解。当是时虏急，人无完心其计划，所以全者，先生力居多，由浑源趋云中，抵代与虏骑前后，见者惊啗指，代藩以其驰不测，致命重之，厚与金帛，一切谢不受。^④

在沈谧擘画、操纵下，才解除浑源之围。本则掌故，一方面凸显沈谧自小以来的统率才能，另一方面也能看似略窥「清闲」的行人官职，仍因人事、职务而异。

沈谧个性刚直，可以下列二事左证：首先，沈谧不曲附上官。行人秩满后，赴选前需拜见吏部尚书，唯有沈谧拱手并不服谒。当尚书切诋论学者时，众人皆唯命是听，沈谧则就试论学，却导致沈谧不被选。^⑤迟于嘉靖十一年（1532）十一月再选，才为刑科给事中。^⑥

再者，能仗义执言。沈谧任职刑科给事中为从七品，职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具有审驳的功能。^⑦嘉靖十二年（1533）十月八日午夜，「四鼓万星纵横流飞，俄陨如雨，至天曙方已」，^⑧自古天变人君修省，沈谧藉此疏言，要求罢用自宫男子二千余人，期望能转灾为福，获世宗采纳。^⑨来年，沈谧升为从七品的刑科右给事中。嘉靖十四年（1535）正月，韦商臣（1490-1559）迁转四川左参议时因考察论罢，肇因于里居给事中杜桐（1494-?）向吏部尚书汪鋐（1466-1536）构陷，虽不知沈谧是否因同遭「吏部尚书」压抑，不禁惺惺相惜有关，但仍与给事中薛宗铠（1498-1535）、戚贤（1492-1553）及御史戴铣（1464-1506）等人上疏申救。^⑩尽管韦商臣虽仍落职归乡，但沈谧敢于表达不平，均能有效发挥给事中之职能。

然而，沈谧仕途仍未拨云见日。即使从右给事中出为山东按察佥事，仍遭到吏部尚书排斥，友人交论，沈谧却遭廷杖。吏部为官员黜陟的核实机构，一旦因人设事，对于官员仕进

^① 明·李东阳纂、明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新北：文海出版社，1979，据明万历刊本影印），卷117，〈礼部七十五·南京礼部·行人司〉，第1702页。

^② 明·陈建，《治安要议》（《丛书集成续编》第50册，据聚德堂丛书排印本影印），卷4〈任官十议〉。

^③ 可参阅王伟凯，〈明行人司机构性质辨析〉，《北方论坛》，2006年第6期，第83-85页。

^④ 明·董份，《董学士泌园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7册，台南：庄严文化，1997，据重庆市图书馆藏明万历董嗣茂刻本影印），卷33〈明故湖广布政司右参石云沈先生墓志铭〉，第9a页。

^⑤ 虽未写明「冢宰」何人，但从时间推断，可能为王琼、方献夫与汪鋐三人之一。若以从前后文推断，以汪鋐最为可能，因汪鋐任期为嘉靖十一年九月至十四年九月（1532-1535）。

^⑥ 《明世宗实录》，卷144，嘉靖十一年十一月丁未条，第1a页：「选授行人陆焯、沈谧……谧刑科。」

^⑦ 清·张廷玉，《明史》，卷74，〈职官志三·六科〉，第1805页。

^⑧ 明·郑晓，《吾学编余》（《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据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影印）。

^⑨ 《实录》并未有嘉靖十二年自宫求进的纪录，但十一年有「礼部奏：净身男子八千余人守关求进」的记载，世宗朝的确是自宫求用风气盛行的时代，就以嘉靖十一年这次八千多人自宫的人数最多，世宗甚至就地合法，将自宫者收用分派，显见沈谧已观察到此一时代现象，因而透过天变要求人君自省。详见《明世宗实录》，卷137，嘉靖十一年四月戊戌条，第5b页；相关研究可参阅邱仲麟，〈明代自宫求用现象再论〉，《淡江史学》第6期，1994，第125-146页。

^⑩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过庭训纂集明天启二年刊本影印），卷46，〈韦商臣〉，第页。

影响甚大。^⑪沈谧因而萌生「不如归去」念头，后以母疾乞休获准。此一家居侍母就是十年，直至母丧。后父亲「东园公」沈复晓以国家大义，才起复为江西按察司屯田佥事，为正五品。此时沈谧已四十余岁。

屯田佥事并非常设，无事即罢。《明史》记载：「屯田道，江西、河南、四川三省屯田兼驿传。」^⑫显见沈谧负有屯田、驿传二职权。至于屯田道官的设计，可以傅夏器（1509-1594）〈赠王育泉擢江西屯田佥事序〉为例：

国朝以兵饷不足，而分其计于屯田，孔沃饶之地，业隶籍之卒，而牧其利，以助什一之供，兼之以水利，欲其因水陆之便宜，以尽地力督之乎？监司肃奸弊也，而常以文学之臣司之，不惟其疏通于古今之变，纵横利害之源，斟酌时宜，详察民故，而措之可经邪？^⑬

从上文来看，屯田道官除《明史》所载的屯田、驿传之外，兴修水利亦是管理的范围。又因屯田道官来自按察司，且出身进士，重监察、倡文教亦为其兼理的范畴。傅夏器小沈谧八岁，其描述应为嘉靖朝的真实状况。沈谧至池州上任后，发现池州屯田废弛状况严重，「屯政废，而池民连他诸郡，豪占屯者不下累万，积三、四十年不输军，暴骸偿，有司莫能问」。^⑭沈谧采取宽民的方式，不追究百姓的拖欠与罪责。到任仅一年余，民却已还田数千。

有江西按察司屯田佥事的经验，世宗则将沈谧调往赣州兵备道平贼，尔后则调往赣北摄理九江兵备。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升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时，二天后却病逝于家中，享年五十三。董份书写墓志铭时，不禁感叹：「公昔谏闾出驰宪垣，二十年而不调，何其进之难也。闻调二日而竟。」^⑮董份亦言，沈谧病时，乡人为其祷告者，常有数百人；而过逝时，吊唁悲哭者亦众。均可资证沈家在秀水的地位，以及沈谧的耿直性格颇得民心。

沈谧娶妻盛氏，但因无子嗣，后再娶妻盛氏，并娶侧室潘氏，分别生二男：嘉靖五年（1526）二十五岁时生长子启原，日后娶钱萱（1503-1547）之女为妻，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次子启文，又名启南，为潘氏出，娶王爱（1507-1571）女。生三女，分别嫁与吴邦校、项国亨、盛朝纲三人，使沈家更为枝繁叶茂。后人中，以曾孙沈德符（1578-1642）最为人熟知，以《万历野获编》传世有名。

三、成为阳明门人

沈谧自幼受阳明言行影响颇深，冲年即仰慕阳明学。一方面，可能与同为浙江人士有关，此时王阳明已历经「龙场悟道」，并在贵州当地讲学后许久，阳明已声名远播，这也是沈谧自幼耳濡目染的原因。另一方面与《传习录》的流布最为关键，是沈谧崇敬阳明学的源头。沈谧曾读《传习录》而有「深得吾心」之感，亟欲渡江从游。《传习录》为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由薛侃刊刻，^⑯内容以呈现阳明与弟子间的问答为多，士人藉由阅读一问一答的方式，来翦除心中疑惑。《传习录》受欢迎的原因，是可透过自行阅读来理解阳明学，即使无法拜入大师门下或聆听授课讲学，也能够透过书本了解当时的热门议题，因而士人习读《传习录》蔚为风尚。^⑰如以「三罗」罗大紘（1542-?）为例，弱冠时友人曾推介《传习

^⑪ 萧慧媛，《明代官员的乞休致仕——官场困局下求退告归的时代现象》（台北：中国文化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第84-85页。

^⑫ 清·张廷玉，《明史》，卷75〈职官志四·各道〉，第1844页。

^⑬ 明·傅夏器，《锦泉先生文集》（明万历刻本影印），卷2〈赠王育泉擢江西屯田佥事序〉。

^⑭ 明·董份，《董学士泌园集》，卷33〈明故湖广布政司右参石云沈先生墓志铭〉。

^⑮ 明·董份，《董学士泌园集》，卷33〈明故湖广布政司右参石云沈先生墓志铭〉。

^⑯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第1255页：「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

^⑰ 张艺曦，《岐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新竹：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第48-53

录》一书，罗大紘称：「一览便与神契，若自暗室睹白日手录，黏案头玩习，朝夕不废也。」

^①罗大紘稍晚于沈谧，但对《传习录》所带来的魅力，依然难能抗拒，爱不释手。

沈谧亟欲渡江从游，但因阳明奉命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征讨而未果，不久便辞世，沈谧哀痛不已。这也是日后沈谧担任给事中时，上疏建言世宗，提出征士吴与弼（1391-1469）、检讨陈献章（1428-1500）以及尚书王守仁三人，「皆卓然为世儒宗，功张绝学，宜下礼官议谧配祀，以风厉学者」之因。沈谧宦游时，常借机与各地士人讨论王学，并以阳明门人自诩。

沈谧既言「阳明门人」，但究竟师承何人？或可透过考察史料略窥其斑：〈沈先生墓志铭〉记载，沈谧为国子监生时，曾前往聆听湛弱水（1466-1560）、薛侃（1486-1545）等人讲学。如以何乔远（1558-1632）《名山藏》的记载，言沈谧于京师听中离先生讲学时，尝言：「师虽歿，天下传其道者，尚有人也。」^②遂「相从讲学，拜师薛侃」，显见薛侃为其师；而盛枫也认为薛侃为沈谧师。^③但朱彝尊的考究异于前说，认为沈谧「师于阳明、甘泉，友于龙溪」，^④表明湛弱水为其师。实际上，这与王阳明、湛弱水二人曾在京师讲学有关：

先是甘泉在京师，与阳明讲求正学，天下靡然从之。号阳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广宗。而阳明早世，甘泉独以高寿作人，学者慕风而至，得以及门为庆幸。^⑤

归纳上述说法，沈谧似乎没有实际拜湛弱水为师。但湛弱水曾有「元宵夜，与梁伯纲、罗逵夫、曾汝忱、薛子修、沈静（靖）夫、王汝中会飲于王伯丰宅」的记载，^⑥沈靖夫即是沈谧，足见湛、沈二人应颇有交情。

或可从沈谧的交友圈看出端倪，沈谧与王畿（1498-1583）私交甚笃，王畿拜王阳明为师。若以陈于陞（1545-1596）〈王公爱墓志铭〉为左证：「又因沈给谏石云，而受业于龙溪王先生。王故王文成高第，其言致良知甚具。」^⑦意谓经由沈谧推荐，王畿成为王爱业师。此外，沈、王二人甚至曾同游天台山，而有〈宿万年山房联句〉问世，足见交情颇深。^⑧除王畿外，沈谧亦曾与钱德洪（1496-1574）、唐枢（1497-1574）等人交往，据载：

尝从王龙溪、钱绪山、唐一庵问阳明之学，而公则早岁从甘泉湛先生讲学，晚亦过文湖书院，拜阳明之像，时与龙溪诸贤研究异同，又所谓斯文契厚者也。湛氏之学曰体认天理，王氏之学曰致良知，宗旨略相类。而公之于师门，笃学力行，兢兢惧末流之失。^⑨

综理上述史料，可以得知沈谧以「师」称王阳明，曾正式拜师于薛侃，湛若水可能为其师，而与王畿、钱德洪与唐枢等人交好。

沈谧对阳明的崇敬，表现在建书院、修生祠二方面。在修筑书院上，沈谧于嘉靖十六年

页。

^① 明·罗大紘，《紫原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据首都图书馆明末刻本影印），卷6〈东抚台王公〉。

^② 明·何乔远，《名山藏》（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据明崇祯十三年刊本影印），卷85〈儒林记〉。

^③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第1333页：「后为行人，闻薛子侃讲学京师，遂师事薛。」；清·盛枫，《嘉禾征献录》，卷22〈沈谧〉：「闻薛子侃讲学京师，遂师事薛。」

^④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据清嘉庆二十四年扶荔山房刻本影印），卷12〈沈谧〉。

^⑤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10，〈学语·甘泉之学〉，第307页。

^⑥ 明·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卷76，〈金台问答录〉，第1918页。

^⑦ 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47，陈于陞〈承德郎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一山王公爱墓志铭〉。

^⑧ 明·潘域，《天台胜迹录》（据明僊居林应麟校刊本影印）卷3〈宿万年山房联句〉，第10a-b页：「天姥频年梦，霞城此日游。浮踪投野寺，远思结云丘。石榴含风晚，岩花带雨秋。杨子在龙溪，兼得宿清幽。」

^⑨ 清·钱仪吉，《衍石斋记事稟》（《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0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刻咸丰四年蒋光焯增修光绪六年钱彝甫印本影印），续稟卷6，〈太常公与石山沈先生书墨迹跋〉。

（1539）十一月建「文湖书院」，以崇祀阳明。据载：

文湖在秀水县北四十里，岁环十里，中横一州，四百澄碧，书院创焉。……遂拜薛子，奉同志王爱等数十人讲学于其中，置田若干亩以贍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员立师位于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诸生虔祀事，歌师诗以侑食。既后，谧起金江西，为师遍立南贛诸祠。^①

此时沈谧以母疾乞休归乡，遂在秀水兴建书院以祀阳明，并率领女婿王爱等人兴学教民。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巡按御史周汝员（1493-?）在此时扮演重要的角色。周汝员为阳明门生，在此年后，藉由职务之便在浙江广建祠庙，先后在越城建有「新建伯祠」、「阳明先生祠」，^②并将王阳明、孙燧（1460-1519）与胡世宁（1470-1531）三位浙江人士合祀，称「同仁祠」。^③周汝员与沈谧同为「门人」，其立祠建庙的举动，对沈谧具有积极且示范的作用。

沈谧约于嘉靖三十年（1602）左右，任职赣州兵备僉事。兵备道官虽典掌武事，却因进士出身，是地方文臣军事领导体制的一环，常担负兴学教化的职责，地方儒学常因年久或战乱颓圮，提倡学政常是兵备道官整饬地方的要项。沈谧深受王学影响，又深居在阳明长年驻扎的南贛地区，实有义务将王学推广。沈谧已在家乡秀水设有书院，此番来到赣州，则以「建祠庙」来宣扬阳明功绩，因此南安府不少属县设有阳明祠。沈谧到任后，发现大庾的阳明祠较为简陋污秽，认为「阳明王公功德，久在人心」，遂与南贛巡抚张烜（1492-?）商议复建。在沈谧的推广与主持下，南贛掀起一股为阳明建祠的风潮，慢慢影响到其他省分，尤其以其故乡浙江的影响最深。^④世宗并不谕祭阳明，但随着民间私祀者众，穆宗赐祀并改为官祭，隆庆时期的祠祀、书院等已达数百所，^⑤沈谧的倡议修筑，是推广王学最实质的帮助。

四、结语

沈谧家族的兴起，与秀水经济发展有绝对关连，再加上祖上善于积攒、生财有道，成为沈谧仕途上最强而有力的后盾。反而，沈谧的宦途较为颠簸，甚至受到吏部尚书的排挤，这与沈谧的个性耿直有关，不愿妥协的结果，反而以母疾乞休，归乡十年。

沈谧自幼以来尊阳明为师，拜师薛侃，与王畿等人交好，怎么把王学推广，成为他归乡的要务，兴建书院讲学成为最直接而有效的作法。所以沈谧邀请王爱等人不仅讲授学问，也试图把王阳明的学问、美德与功绩加以宣扬。特别是沈谧来到江西，这个阳明长期经营的地区担任兵备道官后，更是积极地透过兴建祠庙，将「王阳明」、「王学」推广出去，到最后成为西南、江南共同崇敬的人物，这样的流风以浙、贛为盛。沈谧的儿孙也受到王学浸淫，不仅持续经营「闻湖书院」，也持续与阳明门人交游。沈家虽不被后人熟知，但其对热心推广文教、提倡心学的事迹仍值得被记录。

^①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第1333页。

^②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5，〈年谱三〉，第1297页。

^③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据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影印），卷21，〈祠庙〉。王世贞则记「三仁祠」，本文从田汝成所记。详见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3，〈壬子浙江三仁〉。

^④ 董华、李平，〈赣南王阳明祠与其他地区之比较〉，《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6期，2020，第32-40页。

^⑤ 清·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台南：庄严文化，1996，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影印），卷1。